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6 期 总第 54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6 期 · 总第 54 期

热点观察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单边制裁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	3
能源危机对德国企业形成巨大冲击波·····	4
外贸疲软成法国经济“绊脚石”·····	5
东南亚将成国际贸易新增长极·····	6

学科前沿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7
“统一大市场”与“双循环”一脉相承·····	11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特征与中国的应对·····	14
中国海外投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8

经管资讯

经济体制改革阔步向前·····	23
上海：非凡十年创新与发展齐头并进·····	25
10 年来全国新设“四新经济”企业 2545.4 万户·····	28
依法保障稳外资·····	29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0月17日，党的二十大新闻中心举办记者招待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辰昕，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丛亮，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京东等三位代表就“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赵辰昕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3.9万亿元增长到114.4万亿元，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3%增长到18.5%，提高了7.2个百分点，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长到81000元。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我国经济建设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伟大成就，是在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各类重大风险挑战接踵而至的大背景下实现的，的确来之不易。这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得益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赵辰昕说。

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赵辰昕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也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同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都比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赵辰昕表示。

赵辰昕说，下一步，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持续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内国际循环顺畅联通。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守住能源安全底线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如何？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是好的，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从亮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站上1.2万亿斤台阶，自2015年起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基础不断夯实，全国建成9亿亩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

当前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如何有效保障粮食安全？从亮表示，具体包括五方面举措：落实“藏粮于地”，加大耕地保护和农田建设力度；坚持“藏粮于技”，强化现代种业等科技支撑；优化生产布局，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收储调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粮食供需动态平衡；开展节粮减损，促进粮食节约和营养健康。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在国际能源供需紧张和地缘政治多变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我国如何守住能源安全底线？

任京东介绍，接下来将重点从三方面着力守住能源安全底线：扎实抓好固本强基，充分发挥煤炭的压舱石作用和煤电的基础性调节性作用，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扎实抓好有序替代，全面构建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扎实抓好风险管控，大力推进能源安全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煤炭、油气、电力供需等预警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任京东介绍，近十年，我国能源消耗强度累计下降了26.4%；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突破11亿千瓦。接下来，将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坚定不移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重点包括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积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推动终端用能转型升级等。

3 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如何？

赵辰昕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月度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三季度经济明显回升。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表现也依然突出，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与全球通胀高企形成鲜明对比，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赵辰昕说，从多个经济指标综合来看，我国经济的表现依然突出。

赵辰昕表示，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困难和挑战，但更加充满机遇。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当前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更要看到，面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影响，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企稳回升，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力。“我国有14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产业链、日益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这些基础条件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广阔市场空间。”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凝聚了磅礴伟力、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相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方向，随着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中国经济回稳向好的态势必将进一步巩固。”赵辰昕说。

作者：齐志明 丁怡婷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18 日第 004 版

单边制裁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冻结的阿富汗央行价值 35 亿美元资产转移至瑞士新设立的“阿富汗基金”，并声称，除非阿央行能确保不受政治干预，否则该基金不会直接向其提供资金。阿富汗的国家财产本应立即全部归还给阿富汗，用于改善民生、和平重建，美国政府却对他国合法财产肆意支配，是赤裸裸的抢劫行为。这是美国凭借霸权地位行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又一铁证。

制裁措施是联合国安理会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特殊工具，任何国家都无权公器私用。但长期以来，美国在于法无据的情景下，为维护本国霸权，大肆施加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近年来，美国变本加厉，常态化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贸问题武器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领域从传统的反腐败、出口限制、反洗钱等向人权、高科技产业、数据主权、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扩展，并将这一非常规手段常规化，通过巨额罚款、派驻监管专员、逮捕及拘禁相关人员等多种形式来实施。

把美国称为全球唯一“制裁超级大国”实不为过。对古巴实施长达 60 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对朝鲜不断加大制裁力度；10 年内两次将伊朗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禁止其他国家个人或实体进口委内瑞拉原油；联手其他西方国家加码对俄制裁……美国还制定《反海外腐败法》等一套贸易制裁法律，并通过扩大这些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对其他国家施压。

截至 2021 财年，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累计达 9400 多项，较 20 年前增长近 10 倍。仅美国上一届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就高达 3800 项，相当于平均每天 3 次挥舞制裁大棒。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德雷兹纳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手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但是美国滥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损害了相关各方的正当权益，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粮食和金融安全等方面的危机和挑战，让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作者：郭言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9 月 29 日第 004 版

能源危机对德国企业形成巨大冲击波

欧洲能源危机已影响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经济衰退风险也被放大。近来外媒的多项报道还显示，能源危机不但使通胀高企，民众生活受到影响，不少德国大型企业也已感受到丝丝寒意。

德国能源企业首当其冲受到巨大打击。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曾警告，欧洲能源市场可能出现“雷曼兄弟时刻”，即能源公司破产潮，并承诺尽力阻止类似的危机。当地时间 9 月 21 日，德国政府与能源巨头 Uniper 达成协议，将斥巨资购买该集团股份并使其国有化，以防该国能源行业崩溃。德国政府还有意将另外两家天然气公司 VNG 和欧洲安全能源公司一并国有化，其中欧洲安全能源公司前身为俄气公司在德国的分公司，于今年 4 月被德国政府接管。Uniper 能源集团是德国最大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商，为 100 多家市政公用事业单位和大型公司提供天然气，德国天然气消费量的约一半由其供应。乌克兰危机使其失去主要天然气供应来源，在履行供气合同压力下，Uniper 被迫高价在现货市场购买天然气，每天损失超过 1 亿欧元。该公司今年前 6 个月亏损已超过 124 亿欧元，其中 65 亿欧元与俄罗斯限制能源供应有关。

除了风口浪尖上的能源企业，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大型企业也难以幸免。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在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均拥有大型工厂，而这些恰是欧洲最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据彭博社报道，大众上周宣布，如果天然气供应问题在今冬后长期存在，很有可能将生产迁出德国和东欧国家，转移到其他欧洲西南部国家或北欧沿海地区等地，因其更易获得海上进口的液化天然气（LNG）。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显示，能源危机给卫生纸制造商等德国工业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一些公司已减产或停产。德国造纸行业代表表示，即使有政府支持，造纸厂也将难以生存。早前，德国最老牌的一家卫生纸制造商哈克尔（Hakle），已因能源价格上涨、纸浆价格高企、运输成本增长等因素，无力负担生产成本而申请破产。能源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企业的冲击面十分广泛。业界人士认为，德国大众的遭遇也折射出欧洲工业布局面临的挑战。

更为严重的是，业界担忧，能源价格长期走高，德国有自动去工业化的风险。德国工商会一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3500 家公司中，16% 的公司已经减产或停业。与此同时，能源危机下，德国也出现了暴利企业。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德国，仅有部分天然气被用于生产电力，但由于该国能源市场制度设计的问题，天然气价格的飞涨将推高其他能源价格，这也导致从其他途径（如风能、太阳能或煤炭）生产电力的供应商获得巨大利润。

面对能源危机带来的冲击，德国政府 9 月 4 日宣布了一项 650 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该计划包括推进能源市场改革，对能源交易进行限价，重点是以征收“超额利润税”的形式“打击牟取暴利的能源供应商”，并将税收用于各项救助措施，部分收益将用于向 9000 家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 17 亿欧元的税收减免。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表示，如果电价进一步上涨，援助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作者：周武英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2 年 9 月 29 日第 002 版

外贸疲软成法国经济“绊脚石”

法国近日公布的 2023 年财政预算法案显示，2022 年对外贸易逆差预计将达 1560 亿欧

元,较 2021 年几乎翻了一倍。外贸持续疲软成为法国经济复苏道路上无法忽视的“绊脚石”。尽管法国对外贸易常年处于逆差状态,但近年来逆差大幅增长显然远超历年平均水平,承压趋势日益明显。根据法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在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法国 2021 年经济相对回暖,以 7% 的增速创下 52 年来的新高。然而,在当年外贸数据公布后,经济增速创新高的“风头”第一时间便被夺走。2021 年法国外贸逆差高达 847 亿欧元。这一“创造了历史纪录”的数据一经公布便引发舆论热议。有法国媒体称,2021 年的经济增速被外贸表现所“玷污”。2022 年 8 月,法国政府公布上半年外贸逆差,数额高达 710 亿欧元,同比增加超过 200 亿欧元。新任部长级外贸代表奥利维尔·贝希特不得不委婉地承认,“这个数字不是十分令人鼓舞”,同时表示短期内尚未看到改善的迹象。近日马克龙政府公布的 2023 年财政法案不仅指出法国 2022 年外贸逆差将达 1560 亿欧元,同时预测 2023 年将达 1540 亿欧元,再次点明了法国外贸疲软的长期趋势。这些数据从侧面印证,外贸问题将是法国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的经济难题。

法国外贸逆差为何突然大幅增长、屡破纪录?究其原因,能源价格上涨是背后的主要“推手”。2021 年法国外贸逆差较 2020 年增加约 200 亿欧元,这与天然气及石油价格上涨关系密切。当年,在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 68% 的同时,法国能源费用亦从 2020 年的 252 亿欧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431 亿欧元。今年,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法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0 年第二季度至 2022 年第二季度,进口能源价格大涨 5 倍,2022 年以来贸易平衡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能源费用上涨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其所导致的外贸失衡冲击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还有工业界与市场信心。法国国家统计局 9 月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当月法国商业环境走弱,除建筑行业外,所有行业对市场前景恶化的担忧均有所上升。超过一半的工业企业认为,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

牛津经济研究院专门研究法国经济的卡多·马切利·法比尼亚警告称,2022 年法国工业生产将收缩,近年稍有复苏迹象的法国工业竞争力将受到负面影响。法国宏观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杰罗夫的表态则更为尖锐:“与不受此次能源价格上涨影响的美国与中国工业相比,能源价格飙升导致了法国工业竞争力的下降。”相比于经济学家,企业界的体会更为直接,悲观情绪弥漫。法国中型企业运动主席弗雷德里克·克里坦坦言,将有十分之一的中型企业停产,法国正面临 2008 年后新一轮去工业化的浪潮。近年来,法国外贸逆差不断攀升,此前长期“去工业化”政策的负面效应显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国外贸的失衡态势在能源价格上涨冲击下再度加剧,成为经济复苏与再创活力的重要制约因素。马克龙政府极力强调的工业回流与战略自主亦受到连带影响。

目前,外贸失衡严重化、长期化已成为法国经济面临的难题,而能源价格上涨因受到地缘政治等多重外部因素影响,绝非法国一家所能彻底解决。毫无疑问的是,这一难题将“陪伴”马克龙度过第二个五年任期。

作者:钱通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10 月 13 日第 012 版

东南亚将成国际贸易新增长极

近日,全球物流企业 DHL 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联合发布了新版《DHL 贸易增长地图集》,描绘了全球货物贸易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展现了市场冲击下全球贸易的韧性。

报告揭示，“近年来，中国贸易增长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东南亚和南亚将成为新的贸易增长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贸易增长将大幅加快。”这份地图集涵盖了全球 173 个国家和地区，可为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导者提供更具商业价值的市场趋势信息。DHL 快递首席执行官鹏程说，“几个世纪以来，贸易始终是推动并实现全球繁荣的关键驱动力。在当前全球商业环境中，DHL 可以帮助客户重新梳理供应链布局，合理权衡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搭建更为安全、高效的供应链。作为服务全世界的物流企业，我们有能力提供满足客户各种需求的物流解决方案，并能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提供稳定、可靠的服务。”

在当前市场环境中，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不仅可加速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还能助力企业与国家从更多样的来源获取主要资源。这份贸易增长地图集聚焦增长、转变与新机遇，衡量了各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地图集给出了如下判断：“与许多人的预期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成为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阻碍：在供应端瓶颈制约进一步增长的情况下，国际货物贸易总量仍超过疫情前水平 10%。”“贸易增长前景依旧乐观——虽然贸易增长预期因地缘冲突遭遇下调，但 2022 年和 2023 年的增速预期仍将略高于此前十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在疫情期间大幅上涨，跨境电商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此项联合研究认为，更多国家将迎来贸易增长。近年来，中国贸易增长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据预测，其未来的增长量仍将保持首位，但所占份额或将有所下降。至 2026 年，越南、印度和菲律宾的贸易增长速度和规模将格外受到关注，并将为企业更多样化的生产和采购策略中获益。2000-2012 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从 24% 提升至 40%，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中国。这一份额比例在过去十年鲜有变化。“但是，新兴经济体在互联互通、创新和领军企业方面仍保持高速发展。它们在高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领域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并不断提高除低成本外，在创新和质量方面的竞争力。”

基于对全球贸易增长趋势、地理变化、贸易产品组合和商业环境广泛变化的研究，按照不同维度，《DHL 贸易增长地图集》对各地区、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以及 173 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货物贸易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为每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页摘要。这些国家和地区涵盖了超过 99% 的全球贸易、GDP 和全球人口。“我们提炼出关于全球贸易状况和发展轨迹的最重要数据，并以地图、图表和其他可视化方式进行呈现。结果显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以及世界各地仍蕴含巨大的贸易增长机会。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并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报告有力地反驳了全球贸易将出现重大倒退的预测。”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未来管理中心高级研究学者、DHL 全球化研究项目总监史蒂文·阿尔特曼表示。

据介绍，《DHL 贸易增长地图集》是对《DHL 全球连通性指数》系列报告的补充。前者对全球货物贸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后者自 2011 年起定期发布，从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全球资本、人员和信息流动等维度对全球化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和解读。两份报告皆旨在发掘潜在商业机会，并基于事实和数据对贸易和全球化进行探讨。

作者：秦志刚

来源：《国际商报》2022 年 9 月 26 日第 004 版

学科前沿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本期邀请相关专家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行研讨。

1 数字经济与生产过程融合的特征

主持人：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和生产领域融合呈现出哪些特征？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与公平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数字技术之所以能够转化为一种经济形态，需要具备几个基本要素，换言之，数字经济和生产领域融合，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信息密度空前增加。数字经济产生的前提是数据信息或数据资源若干个数量级的提升。与数据增加相伴随的是节点之间网络式连接的形成，这大大提升了整个世界的连接程度。当实体被镜像化以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优化。信息密度的增加，网络式的连接，空间、时间的优化，这可能是数字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并转化为数字经济后需把握的几个关键性变量。二是从消费到生产领域依次深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开始于消费领域，尤其是面对消费者的零售领域。之所以始于零售，是由于个人交易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较为简单。在通过支付平台解决信任问题后，商家对消费者的交易成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种形态的数实融合迅速发展，并对整个零售环节的商业组织带来较大冲击，原有组织结构解构或者重组，形成一种新的商业形态。如果说进军消费领域是数实融合的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就是进入生产领域，也就是面向商家。相比于“对消费者”模式，“对商家”模式在交易费用和交易环节上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交易费用将大幅提升、交易环节更加复杂。生产领域的数实融合值得深耕，而且能创造更大价值。三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预测技术、区块链技术等为数实融合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时间序列预测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转向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在效能优化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例如，利用深度学习进行高频模拟，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和把握外部世界运转状况。基于去中心化特征，区块链技术在防止欺诈方面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为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有利手段。

无论是消费领域还是生产过程，都有可能通过高度数字化实现信息打通，大幅减少采购、生产、销售成本，优化业务流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或缓解市场盲目性问题。当数字经济真正深度融入生产过程后，企业组织和供应链形态将会发生很大改变。

考察数实融合进程或阶段，可以引入一个概念：实体经济的数字化率。“不同阶段适宜的数字化率”将有可能成为我们设定并为之努力的目标。

数实融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情况。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固然要引起警觉，但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把制造物品的部门叫作实体企业。现在实体经济中真正有竞争力的，是被数字化改造过的企业。

除制造业以外，值得关注的另一部分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合计占 GDP 的比重，或许能更准确地体现实体经济的制造能力。这两者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地理空间布局上紧密联系。从制造业数字化率角度来理解制造业发展，才更加切合实际，更有利于我们把握数实融合的真实境况。

2 未来经济的主导形态

主持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它与工业经济有何区别？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从历史过程来观察数字经济，可以大体得出三个观点。第一，数字经济是数字革命的成果。人类即将进入的数字文明，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并不是工业革命的简单延续，它已超越工业革命的逻辑。数字经济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而工业经济恰恰是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显然其间的属性差异是巨大的。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主导形态。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也将成为未来社会和未来政府的主导形态。从这个角度看，数字革命不能被简单归结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能仅仅从技术角度去理解它，要从文明革命的高度去认识它。农业经济，用千年跨度看待才能见到其变化。工业经济，用百年跨度就能观察到显著变化。数字经济，十年跨度即发生重大变化。人类文明呈现加速发展态势。现今，数字革命与数字文明正摆脱传统主导经济形态的旧轨道，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应瞄准数字化，以数字化为主导，以工业化为基础。一方面，工业化仍要继续推进；另一方面，要看到此时工业化和数字化是叠加在一起的，不能刻板因循先工业化后数字化的升级路径，而是要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技术，其次是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有通用性，人工智能、算法各行业都能使用。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大家可以共享，类似于公共产品，而与公共产品不同的是可以依据场景反复开发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都具有非实体性，比如虚拟制造技术的发展，让研发、设计和试验过程大大缩短，成本降低、质量提高。这种非实体性、虚拟性，带来深度渗透、要素共享、跨界融合，由此，整个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生活方式都将以数字化方式存在。这种数字化方式是一种虚拟与实体的叠加，这种叠加态势在工业社会从未有过。与这些特点相适应，在政策和治理层面应强调数据要素的流通共享。第二，数字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各个产业数字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要实现数字化。通过数字化，实现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变身”，实现产业脱胎换骨的发展。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崭新动能在于数字化。以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像衡量工业化程度一样衡量数字化程度，以此推动各产业向数字化轨道切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到 39.8%，这可以近似理解为我国经济的数字化程度。各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意味着这一数字要达到 90% 甚至更高，直至实现全面数字化。第三，各种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的神经中枢，如同工厂之于工业经济。要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加快社会数字化以及政府数字化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互为条件，政府自身的数字化建设也要纳入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模式去考量，在此过程中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此外，数字化的价值还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组织方式，如研发、生产、营销等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二是就业形态发生改变，工厂的劳动雇佣关系向劳务合作关系转变。三是大大扩展了可交易的资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界限不再清晰。四是生活方式发生剧变，

生活空间从物理时空扩展到虚拟时空，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社会联系被彻底改变。这些新变化将会衍生出新的理念、新的规则、新的理论和新的经济学。

3 发挥大企业创新引领作用

主持人：推动数实融合从企业或行业层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樊纲【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按照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数字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视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讨论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实际上是在讨论怎样使数字技术企业更好为其他产业，特别是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服务，使这些产业实现数字化。第一，实现数实融合，要考虑数字化成本问题。数字技术在电商、物流、广告等领域应用发展很快，取得了较大成效，现在比较滞后的是制造业数字化。这当中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硬件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成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往往不是一次性的，且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数字化改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数字化和精细化方向，是整个企业构架、组织形式的再造，这种转型显然也需要成本。第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对企业的一种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专业化企业进行专业化服务，从实体企业需求出发，找到各种合理解决方案。制造业企业内部原本存在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一些部门，但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诸如工业设计、物流、运输、仓储以及信息服务部门等原先在企业内部的服务业逐步被分离出去，以专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式存在。这种分工可以促进企业发展，提高整体产值，是有效益的一种改进。考虑制造业比重，其实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一起纳入，按照大制造业的概念来计算。如果加上过去存在于企业内部被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很多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其实并没有下降。理解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明确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业，要服务制造业、服务农业，服务实体经济。第三，积极发挥大企业作用。大企业在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上更有优势，有利于开发新产品、新功能。就数字经济而言，有规模效益才能有竞争优势。此外，大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综合性服务。

鼓励平台企业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当然，对大企业也要有各种监管措施，而且监管要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未来企业的演化存在不确定性。数字技术的生产性服务需要专业，需要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多样性、小而美也是企业未来演变的趋势之一。数字经济发展既需要大企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也需要一些小企业的专项和专业服务。数字经济新的形态以及它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使各种企业在这个空间中都能获得较大发展。

从经济政策角度讲，我们要鼓励大企业发展，要着眼于如何推动大小企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产业更好发展。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大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共同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以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

4 平台经济催生新业态

主持人：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将会对经济运行模式和企业形态产生怎样的影响？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作为数字经济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平台经济是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并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工具撮合交易、传输内容、管理流程的新经济模式。经过十几年发展，我国平台经济取得了较大成

绩，是迄今为止少数紧跟国际技术前沿、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行业之一。

从重要性看，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头。我们测算显示，从2012年到2018年，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5%。经济发展要靠创新，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是支持创新的重要力量。

从趋势看，平台经济出现了从消费到生产端的转化。目前为止比较成功的数字平台，绝大部分是在消费端，以个人用户为主，无论是支付、网购、外卖、打车或者社交等，基本都是由消费场景或个人用户场景催生出一大批新的业务模式，借助十几亿消费者构成的强大市场而发展壮大。目前的数字平台发展开始走向生产端，这将会使生产出现一些新特点。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边界问题呈现复杂性。比如，企业会变得更大还是更小，产业组织将会更具综合性还是更加专业化，核心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会变得更重要还是不重要，这些变化对于将来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影响，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关于企业边界，过去往往从规模报酬递减理论出发，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的企业规模，超过之后适得其反，并不是越大越好。现在技术发展，情况随之出现变化。根据经济学家科斯对于企业边界的分析框架，企业组织的经济活动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的企业组织协调进行，另一种是通过支付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实施。企业的界限划在什么地方，最终要看是市场的交易成本高，还是企业的组织成本高。如果后者超过前者，宜小；如果前者超过后者，宜大。

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用到经济活动中，会有很多新的改变，甚至会改变过去经济的一些运行模式，可总结为“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指提升规模、提升效率、提升用户体验。“三降”就是指降低成本、降低风险、降低接触。

数字技术应用到生产活动中，会同时产生两方面的可能性。数字技术应用于制造业，很可能导致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市场交易成本也会降低，不同企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这是产业互联网带来的一个巨大红利。

过去的消费互联网，把十几亿消费者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庞大市场，对卖方产生吸引力。将来我们也可能在生产端和供给端形成巨大的网络效应，通过整合生产者，使整个行业变得更加活跃，更快推动创新。这有助于形成供应链服务的社会化协同机制。很多产业在过去难以解决内外部协调问题，归根结底是无法解决内部组织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比重问题。平台经济使这种情形得到改观，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能够降到足够低，实际上很多劳动分工就可以进一步细化。

这样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成型，需要做很多努力，包括通过大平台或产业互联网来实现企业间的整合，以及发挥政府、大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统一数据等先期准备工作，为未来有效形成新型产业组织铺路架桥。

5 数实融合重构企业创新模式

主持人：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有哪些影响？

安筱鹏（阿里研究院副院长）：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45.5万亿元，这一经济规模由两部分构成：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为8.3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7.18万亿元。从统计角度来讲，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带来很多变革，从实践角度看，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以下几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用户深度参与。“95后”“00后”新消费人群出现，这部分群体拥有新的认知方式，其决策逻辑也在发生变化。数字技术使消费者拥有更大表达权、参与权、话语权，消费更具个性化、实时化、场景化、内容化、互动化。如何响应这种变化，让消费者参与创新，对供给端提出新要求。第二，零成本试错。数字孪生技术正在为创新构建一个通向零成本试错之路的新模式。先在数字世界进行产品模拟，再在现实世界快速响应，对各项参数进行分析和优化，从试验验证到模拟择优，提供了有利于精准研发和提升产品创新速率的新业务方法论。应用数字孪生技术的生产线，产品研发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第三，高频迭代。数字技术给创新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创新频率、迭代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品牌及分销、运营分析周期、新产品上市周期等创新闭环周期大幅压缩。企业竞争是各环节都在提速的高频竞争，各环节提速是企业竞争的法宝，也是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第四，数据驱动。高效率的资源配置越来越依靠数据流动。无论是创新、生产还是决策，都呈现出数据驱动特征。科学、精准的资源配置就是要把正确的数据以正确方式在正确时间传递给正确的人和机器。数实融合在重构企业创新模式的同时，自身也呈现出一些新趋势。近期阿里巴巴发布的《2022 数实融合趋势观察》指出，数实融合正从消费迈向生产、从餐桌走向土地，从大企业到中小微企业，从数字化转型到天生数字化，数字化与低碳化开始孪生发展。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企业，提供了丰富便捷的数字化工具，让各行各业数字化的门槛不再高不可攀，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加速了数字化进程。

总之，数字技术带来多重影响，其中对企业创新模式的改变是一个重要方面。就平台经济而言，基于数字技术平台，通过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广泛连接、高效匹配和动态优化，平台型技术创新体系构建起多主体协作、多资源汇集、多机制联动的创新生态，进而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快速孵化、规模扩散、持续迭代的新型创新体系，这或许是未来 10 年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制胜点。

作者：徐向梅（主持人，《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9 月 23 日第 011 版

“统一大市场”与“双循环”一脉相承

中央和国务院于 2020 年 5 月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即“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今年 4 月又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文件，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两者相关，但又有所不同。那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实际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关键部件——市场流通机制的加速优化。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应因新的国内国外形势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深谋远虑，一方面可以说是应对美国大力推动中美经贸脱钩的被动或被迫之举，另一方面却是预防中美经贸大幅脱钩的主动或积极作为。美国大力推动与我国经贸脱钩并拉拢盟国这样做是其霸道本性使然，“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国不愿看到而只能坦然应对，所以采被动或被迫之举。但又要为脱钩的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因而行主动或积极作为。逻辑是显然的，既

然中美脱钩必将造成我国经济的国际循环大规模受阻，当然就应加速经济的国内循环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应有增长。

如果以经济学语言将经济的国内和国际分别表述为内需和外需，即内部需求（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及库存增加）和外部需求（货物和服务出口及外部投资）的话，“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要点有三，一是内需要进一步做大，二是内需要加速循环，三是内需和外需的双循环要相互促进。

第一，内需要进一步做大，即不但要继续增长而且在经济中的占比要进一步增加。这首先是逻辑使然，经济由内需和外需组成，既然外需由于中美经贸脱钩而面临收缩或至少增长放缓的威胁，为弥补此损失而保持经济增长，自然要求内需进一步做大。其实，从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角度，2021 年我国人均 GDP、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80962 元、31206 元和 39139 元人民币，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差距很大，而我们的目标是这些指标在今后 20-30 年内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一步做大内需也是势在必然。

第二，内需要进一步做大取决于加速其循环。所谓循环，就是不依赖于外力而内生性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则，内需循环，就是内需不依赖于外需而内生性或自我实现式地运动。正向运动产生增量，运动越快增量就越大，则加速内需循环就是加快内需的正向运动速度，其结果必将是内需的增量不断加大，即内需进一步做大。如何加快内需的正向运动速度呢？就是要消除内需运动的各种障碍，促使内需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通畅地运动，以至于充分循环。我国经济以内需为主导，内需的循环空间，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巨大的，所以是内需大循环，即国内大循环，为内需和外需“双循环”，即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主体。

第三，内需与外需的“双循环”要相互促进，首先意味着，虽然强调内需大循环，但不能放弃外需循环。很多人认为，现在提出内需大循环意味着要主动放弃或不得不放弃外需循环。主动放弃是没有理由的，对外开放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至于不得不放弃，从预防角度值得深思。若从经济角度，不值得担忧，即使是中美关系也不至于完全脱钩。当然，若从政治角度，美国强行地不但自己也拉拢一些国家与我国完全脱钩，则我国的外需将会大大减弱。但也不会消失，毕竟美国不可能拉拢到其所有的盟友，而我国的友好国家队伍在不断壮大。所以我们仍应力保外需的现有循环并寻找新的外需循环。内需和外需双循环相互促进还意味着，内需循环和外需循环既竞争又互补。竞争体现在市场价格与份额的争夺上，客观上将促进内、外需循环质量的双双提高。互补对我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更加重要，通过出口和对外投资形成的外需循环的收益支撑进口和外商投资带来的内需循环的产业和技术升级；后者又将促进前者的质量提升。

以上三点中，重中之重是加速内需循环。内需循环实际上就是内需各经济要素的循环；加速内需循环就是要提高经济要素循环的速度和效益。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加速内需循环应以三大加速为目标。一是加速市场流通机制的优化，在劳动力/人才、资金/资本、土地、科学/技术与商品/服务等各个领域打破阻碍经济要素流通的地区、行业及层级壁垒，形成统一、竞争、有序、开放的市场流通体系。二是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我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点，即信息革命和绿色革命的爆发时刻。我国在这一革命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今后将向信息社会和绿色社会升级。这一升级催生信息/绿色消费和投资，而信息/绿色消费和投资又将衍生并改造一系列的新产业与新产品，是内需经济要素循环的主要新兴力量；加速内需循环，就要加快这一升级过程。三是加速区域结构的升级。我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正处于城市群兴起的升级过程之中。城市群兴起，则各经济要素随人口聚集而重新配置于城市群，是空间意义上内需循环的新兴力量。我国正在兴起十大大城市群，其中，

长三角、珠三角（现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已具相当规模，但与世界级城市群比较发展程度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余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发展程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加速内需循环，就应加速这些城市群的兴起。

应该指出的是，三大加速中市场流通机制优化的加速，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结构升级加速的前提，因而是加速内需循环进而“双循环”的关键。

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市场流通机制的优化，为加快内需循环打下体制性基础。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目标是去除经济要素流通的市场壁垒或堵点，充分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提升效率的功能，打造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要素市场流通机制。这正是加速市场流通机制优化的根本所在。

从《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文件中提出的主要举措来看，无论是强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还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以及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等，都是为了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更顺畅地流通，即加速市场流通机制的优化。

其中两大举措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将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作为首要任务，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四方面的市场规则提出统一的要求。构建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以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打造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以坚持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以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等统一化的市场规则建设正是加速市场流通机制优化进而内需循环的重要基础设施。第二，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重中之重，包括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妨碍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的规定做法、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的规定和做法等。

因而，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加速市场流通机制优化的具体举措，而加速市场流通机制优化又是加速内需循环进而“双循环”的关键。如此，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就不难理解了；或采用《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的话，前者为后者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作者：廖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22 年 10 月 8 日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特征与中国的应对

2022 年 5 月 23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时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以美国为首的 14 个成员（其他成员分别为：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斐济）将在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与基础设施、税收（反洗钱）与反腐败等四大支柱、多个领域加强协调与合作，“重新定义美国与其伙伴国在这一关键地区（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五大支柱之一，IPEF 的提出，在为美国印太战略提供新的经济基础的同时，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1 印太经济框架的内涵与特征

首先，在贸易领域，IPEF 将会弥补美国退出 TPP（CPTPP 的前身）后在亚太/印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缺位和空白，恢复、强化美国与该地区的经贸联系。与 TPP 等以关税削减、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为核心要素的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相比，IPEF 更加关注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数字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劳工、环境标准等美国优先或利益集中领域（其中数字贸易规则、劳工和环境标准也是 TPP、CPTPP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TPP 等强约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相比，IPEF 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不必像 TPP 一样须经美国国会授权或批准；也不必像 TPP 一样需要接受“一揽子”规则（IPEF 采用模块化而非“一揽子”模式，成员可在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与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四个模块中选择一个进行谈判，而不必对所有模块做出承诺）。其次，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领域，IPEF 数字经济框架将与 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CPTPP、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一起为美国在区域和全球数字治理领域保持优势地位提供新的路径、模式。作为 IPEF 贸易模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IPEF 数字经济框架将为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要求、源代码和算法保护、交互式计算服务和平台免责、数字知识产权和数字资产保护等美式数字规则/标准在印太地区的渗透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提供新的载体。据 WTO、TAPED 数据库（TradeAgreementsProvisionsonElectronicCommerceandData）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全球共有 188 个区域贸易协定（RTAs）含有与数字贸易相关的特定条款，其中 113 个含有特定的电子商务条款，89 个含有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章节。作为全球第一数字经济大国、第一数字贸易大国（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 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13.6 万亿美元；据 UNCTAD 统计，2021 年美国数字支付服务贸易出口 5330.93 亿美元，约占全球数字支付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 16.83%），美式数字规则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渗透，将为美国维护其在全球数字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第三，在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领域，IPEF 将与美日澳半导体联盟、美日澳印稀土联盟等一起为美国重塑印太地区供应链，维护美国在全球供应链尤其是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关键节点地位发挥新的作用。在新的 IPEF 框架下，美日等国将在半导体芯片、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继续加强合作，以提高半导体、关键矿物、关键原材料（中间品）等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透明度（可溯源性）、多样性（“去中国化”）、安全性和可持续性。以 IPEF 为平台，美日等国还会以所谓国家安全、人权为由，综合使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新的贸易规则（劳工、环境标准）、新的贸易调查和诉讼、限制市场准入等工具，进一步强化针对“第三方”的供应链安全审查机制，维护发达国家在关键行业的领先地位。早在 2021 年 7 月 IPEF 提出之前，美国白宫就曾发布一份关键产品供应链风险评估报告，要求对稀土等关键矿物和材料的提取与加工制定“21 世纪标准”；还以提高半导体供应链透明度为由，要求三星、台积电等多家芯片企业向美国政府提供商业机密数据。同期公布的欧盟供应链多元化计划也将半导体、锂电池、氢能、云计算等 6 个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列入战略规划。而在小多边层面，2021 年 3 月组建的美日澳印四国“稀土联盟”则试图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稀土资源与美国的精炼技术相结合，以减少对中国的稀土的依赖（据 GTA 全球贸易信息系统数据库统计，美

国每年约有 80% 的进口稀土来自中国，欧盟则有 98% 的进口稀土来自中国。另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统计，2020 年，全球稀土储量约有 1.2 亿吨，其中中国储量 4400 万吨，约占全球储量的 36.7%，居世界第一位；IPEF 成员中，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的储量分别为 690 万吨、410 万吨和 150 万吨，分居世界第 5、6、7 位）。第四，在与供应链安全密切相关的尖端技术与标准制定领域，印太经济框架将与美日/美韩关键和新兴技术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关键新兴技术合作联盟、美欧“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等排他性技术联盟一起为美国维护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统一的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将会在人工智能、电信、下一代移动通信（包括 6G）、数字基础设施、云和电信供应商的多样性、开放式无线接入网、量子计算、半导体芯片、标准互认和系统互操作性等关键新兴技术领域继续加强政策协调、联合研究的同时，还会以安全为由进一步加大针对“第三方”的技术封锁和规则围堵力度。早在 2021 年 5 月，美国参议院就曾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明确提出美国要在电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关键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同时发布的《无尽前沿法案》更是将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机、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机器自动化与先进制造、先进通信技术、生物医疗技术和基因组学、网络安全和数据存储管理技术、先进能源、先进材料科学等列为美国关键产业科技十大优先发展领域，并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2021 年 9 月举行的美欧首次 TTC 会议则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和应对全球贸易挑战列入首批 5 个重点合作领域；以 TTC 为平台，美欧欲在尖端技术、标准制定、技术贸易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美欧在尖端技术和标准制定领域的优势地位。在美欧强化技术合作的同时，IPEF 成员中，美日、美澳、美韩也在双边层面加大了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和政策协调力度；日本更是在强化美日技术伙伴关系的同时还与美国一起加大了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力度，部分出口管制对象与美国的“实体名单”高度重合。第五，在清洁能源（脱碳）领域，IPEF 将与美日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美日气候伙伴关系等双边合作机制一起为美国在脱碳、清洁能源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新的平台。以 IPEF 为平台，美日等 IPEF 核心成员将在可再生能源、电网现代化、能源存储、能效标准、智能电网、氢气、碳捕获、碳回收、工业脱碳和先进核能等脱碳和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印太地区实现《巴黎协定》2050 年净零排放目标，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第六，在基础设施领域，IPEF 将与七国集团“重建美好世界”（B3W）倡议、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一起为美国的全球基建计划和在印太地区的落地提供新的支持。在 IPEF 启动之前，美国先是于 2019 年 11 月与日本、澳大利亚一起推出“蓝点网络”计划，随后又在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框架下推出美日澳印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2021 年 6 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又推出 B3W 倡议，着重在数字技术、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领域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援助力度的同时，还与 G20《优质基建投资原则》、OECD“蓝点网络”认证咨询会一起将价值观、标准、贸易、安全、气候等因素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基建计划。同期，欧盟也于 2021 年 12 月宣布启动规模达 3000 亿欧元的“全球门户”计划，在数字、气候和能源、交通、健康、教育和研发等优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加大欧盟战略自主的同时，强化与美国的战略互动和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竞争。

2 印太经济框架的战略目标

首先，IPEF 将与 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一起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与 QUAD 更多强调安全外交、AUKUS 更多集中在军事领域（核潜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技术）的合作有所不同，IPEF 在与伙伴国加强贸易、数字经济与技术、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的同时，还将 QUAD 框架下有关技术、供应链安全、

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等议题纳入、整合到统一的印太经济框架之下。对于美国以 QUAD 为核心的印太战略而言，此举有助于 QUAD 将议题议程集中在安全外交领域，有助于 QUAD 由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向四国峰会机制的升级。不仅如此，IPEF 还有助于美国整合印太地区众多双边合作机制，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将与 QUAD、AUKUS 一起提高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印太地区的集体行动能力，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固有影响力。其次，IPEF 将会弥补美国在亚太/印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缺位，维护美国在亚太/印太区域合作标准与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自 2017 年美国退出 TPP 后，印太地区随即形成了 CPTPP、RCEP 并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在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后，日本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和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多次提议美国重返 CPTPP，在美国明确表示不会重返 CPTPP 的情况下，对于美国而言，IPEF 完全可以看作是 TPP（CPTPP）的替代品（美国总统拜登在 IPEF 启动之前美韩首脑会谈后的记者会上曾强调，IPEF 虽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但 TPP 的一半要素将包括在 IPEF 之内）。以 IPEF 为主体，美国试图在 CPTPP、RCEP 之外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基于规则的排他性区域贸易、生产网络、供应链体系，为美国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提供新的机制。以新的、统一的 IPEF 数字经济框架为载体，美国还想在 TPP（CPTPP）、USMCA、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源代码和算法保护等美式数字规则、标准在印太地区的渗透和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维护美国在印太/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再次，IPEF 将与 QUAD、AUKUS 一起，进一步强化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和同盟内部的凝聚力。自 2021 年 1 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通过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小圈子外交”基本修复了特朗普时期美国与盟友之间因贸易、关税问题而受损的政治、经贸关系。在印太地区，美国通过 QUAD、AUKUS 进一步强化了盟友、伙伴间的军事、安全联系，还将“中国威胁”上升为美国及其盟友所面临的“共同威胁”。随后，美国又在经济领域推出 IPEF，在强化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伙伴间经济联系的同时，还将所谓的“民主”“人权”等因素注入到贸易、投资、科技、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等领域，将美日澳印等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演化、上升为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最后，与新的美国印太战略一样，IPEF 的最终目标是改变、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在当前背景下，美国推出 IPEF 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通过 IPEF 与盟友、伙伴一起构建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充满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经济、技术、供应链、能源、基础设施联盟。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十大行动计划之一，IPEF 的封闭性、排他性特征在强化美日、美澳、美日澳印四国间经济联系的同时，还会让印太地区其他国家面临新的选择困境。

3 中国如何应对印太经济框架

第一，深化区域合作，以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机制应对美国封闭、排他性的地区合作机制。一是以 RCEP 的全面落实和升级为基础，继续深化亚太区域合作进程，有效降低 IPEF 对 RCEP 合作进程的分化、弱化（RCEP15 个成员中有 11 个为 IPEF 成员）。二是以申请加入 CPTPP 为契机（IPEF 有 7 个成员为 CPTPP 成员），加快构建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自贸区战略布局。三是在 IPEF 成型之前（美国计划在 2023 年 11 月 APEC 峰会之前完成 IPEF 谈判）尽快启动《数字贸易协定》（DEPA）谈判进程，继续加大中国参与区域和全球数字治理及规则制定的力度。以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协定为载体，在深化亚太/印太区域合作的同时，有效打破美国借印太经济框架、数字经济框架遏制中国并将中国排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区域合作进程、区域生产网络、供应链体系之外的战略目的。第二，深化多边合作，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对美国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一是继续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共同推进 WTO 改革和 WTO 电子商务谈判进程，提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二是继续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三是继续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四是继续参与引领 G20 合作，巩固 G20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五是继续以金砖国家合作、全球发展倡议强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间共识。六是继续维护 APEC 自主自愿原则和 APEC 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七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继续参与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三，深化周边合作，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营造良好、稳定的周边环境。一是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利益交融和政治互信。二是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深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加深有助于提升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正面认知）。三是以上合组织、“10+3”、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澜湄合作、亚信会议、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等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继续提升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东盟 10 国中有 7 个国家为 IPEF 成员）与中国的合作层次。四是以外交伙伴关系、双边贸易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为载体，进一步提升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互信以及与中国外交立场的一致性。第四，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继续深化第三方合作。“一带一路”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价值链供应链的优化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公共产品属性在为共建国家（包括 IPEF 成员中与中国签有“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提供更多市场、投资和增长机遇的同时，对共建国家与中国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也会产生值得期待的正向作用，在有效降低部分国家对中国负面认知的同时，有效缓解、弱化部分国家尤其是印太地区各国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选择困境。第五，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是对标国际最新规则，继续加大自贸（港）区先行先试力度，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兼容性。二是在增强供应链韧性，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的同时，继续完善、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印太地区各国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继续降低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的过度依赖。三是加快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尽快改变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有效突破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和规则围堵。

作者：王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2 年第 8 期

中国海外投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 1990 年到 2007 年，随着企业离开本土，在海外建立新工厂或收购现有工厂，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增长了 8 倍，从 2430 亿美元增至 2.2 万亿美元（图 1）。

ODI 被定义为投资者在境外企业中获得至少 10% 的股权。它在海外投资者和当地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长期关系，通常被视为一种稳定的跨境资本流动形式。对于投资者来说，出售海外股票和债券要比出售有形资产（如工厂）要容易得多。ODI 创造的稳定、长期的关系建立了全球供应链，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活水平。ODI 有助于将世界连接在一起。

2010–2017 年，ODI 均值为 1.5 万亿美元，占全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的 8%。随

着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对全球化的抵制，2018-2019 年，ODI 均值下降到 1 万亿美元，相当于 GFCF 的 5%。2020 年疫情暴发后，ODI 在去年反弹后再次下滑。即使去年表现强劲，2018-2021 年的 ODI 均值仍比 2010-2017 年的水平低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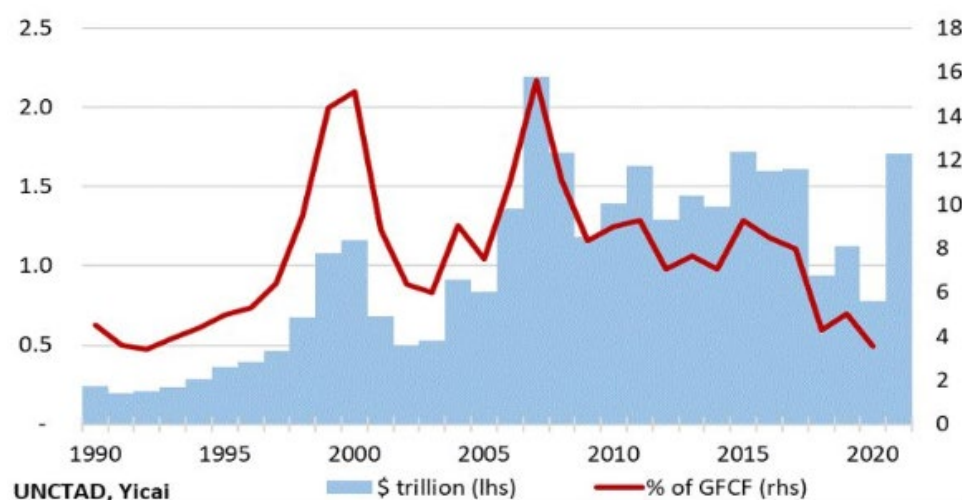


图 1 1990-2020 年全球 ODI 流动

此外，ODI 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 4 年，许多较小的欧洲国家，如荷兰、瑞士和爱尔兰，已不再是 ODI 的重要来源，而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大国的海外投资则相对较多。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全球 ODI 中的份额都有所增加。

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者（图 2）。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崛起还是令人瞩目。2000-2007 年，该地区占全球 ODI 的比重不到 1%。而在过去 4 年里，它的平均份额已经上升到接近 14%，排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列第四，且第二名和第四名之间的差距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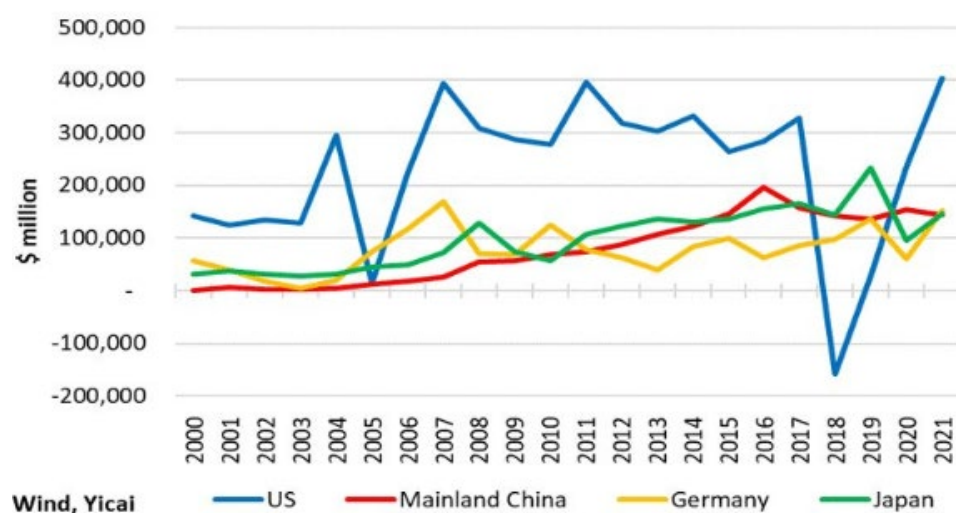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1 年 ODI 净流动

中国内地近四分之三的直接投资仍在亚洲，其中最大的份额流向了香港（图 3）。除中国香港外，东盟（ASEAN）也是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在东盟，中国内地是第四大外来投资者，仅次于美国、欧盟和日本。

近年来，中国内地对拉美的 ODI 有 80%-90% 流向了大开曼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这两个地方是知名的离岸公司管辖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投资最终流向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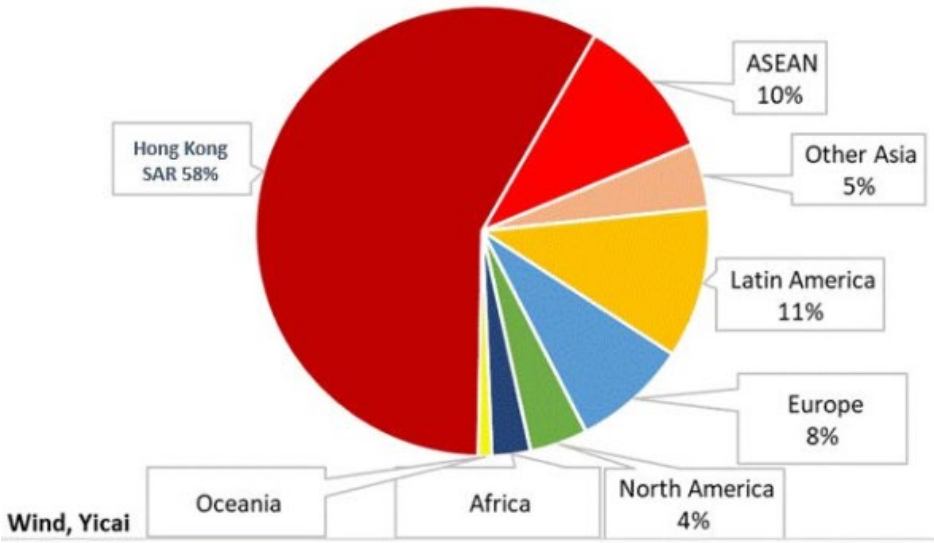


图 3 2020 年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分布

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侧重点与对其他国家不同（图 4）。例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中国内地在东盟和欧盟国家的投资则更注重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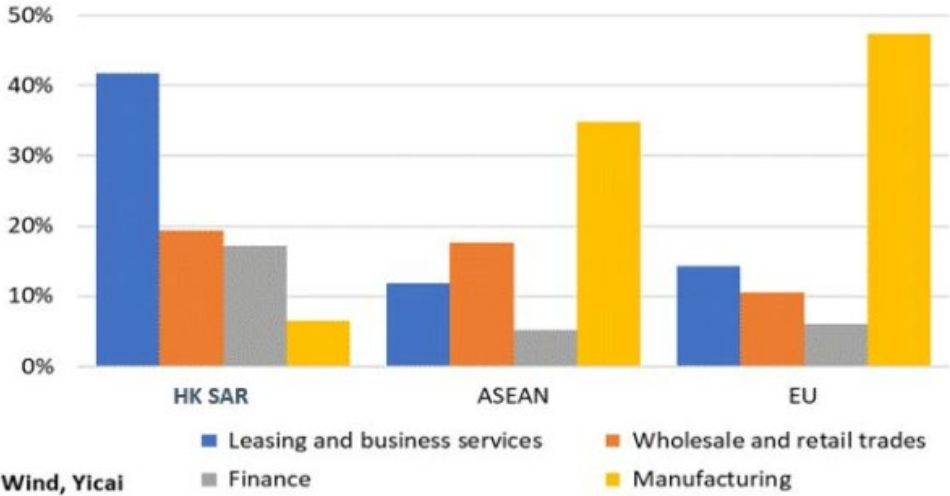


图 4 2016 至 2020 年中国内地对外投资

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在经济上是紧密联系的，大量的跨境直接投资是双向的。中国内地对中国香港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近 60%，中国香港对中国内地的投资约占中国内地外商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

图 5 显示了进出中国内地的投资数据（包含和不包含中国香港）。把中国香港的投资数据除去，我们可以看到转折点出现在 2014 年，当时中国内地显然成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直接投资的净提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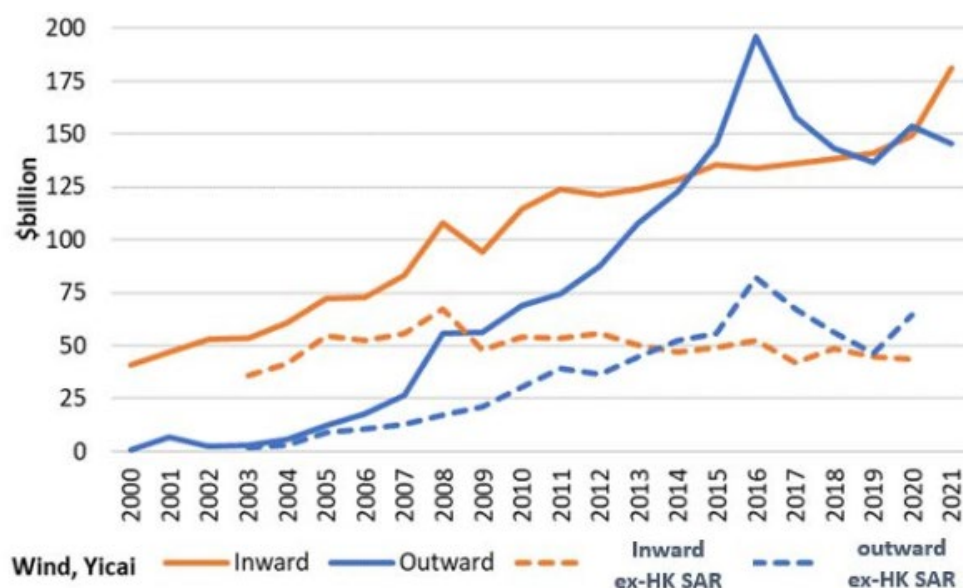


图 5 进出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

中国内地的很多对外投资都流向了“一带一路”的参与国（“一带一路”是为加强区域合作提出的倡议，包括很多项目）。2021 年，中国内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200 亿美元，占中国内地非金融对外投资总额的 18%。近年来，中国内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比重逐年上升，今年前 7 个月继续小幅增长（图 6），尤其是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联酋、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孟加拉国的投资增长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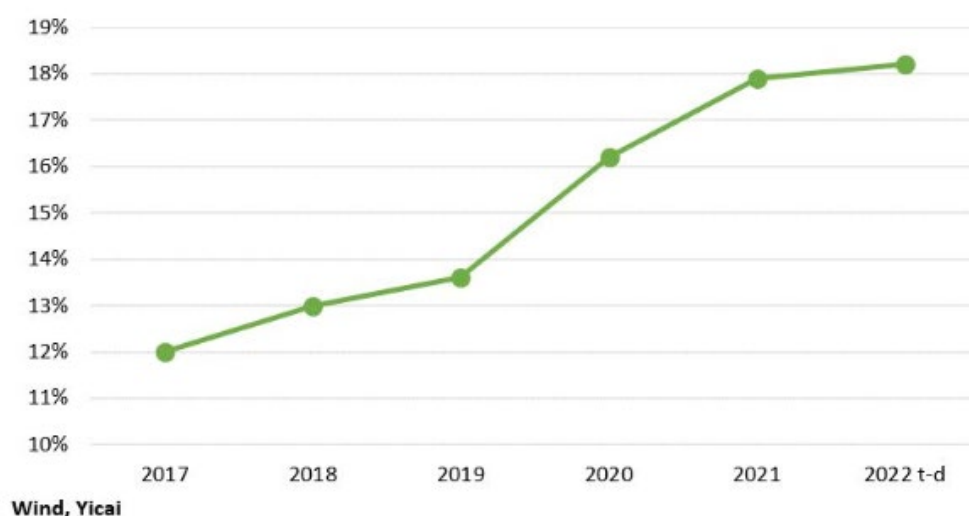


图 6 中国内地对“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对外投资比例

虽然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对外投资金额大幅增长，但仍局限于地区范围，中国内地尚未成为全球投资者。另外，中国内地作为全球投资者的投资规模并不大，这与其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内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地区，远远领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美国和德国（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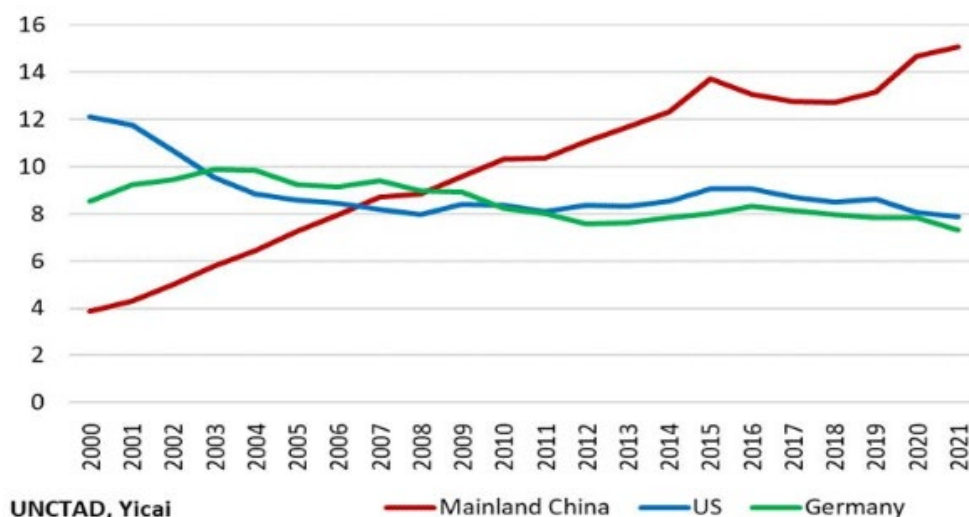


图 7 各地区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占比 (%)

中国内地的商品进口份额在全球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且大幅超过排名第三的德国（图 8）。对于图 8 中发展轨迹的观察则表明中国内地会在这个十年结束前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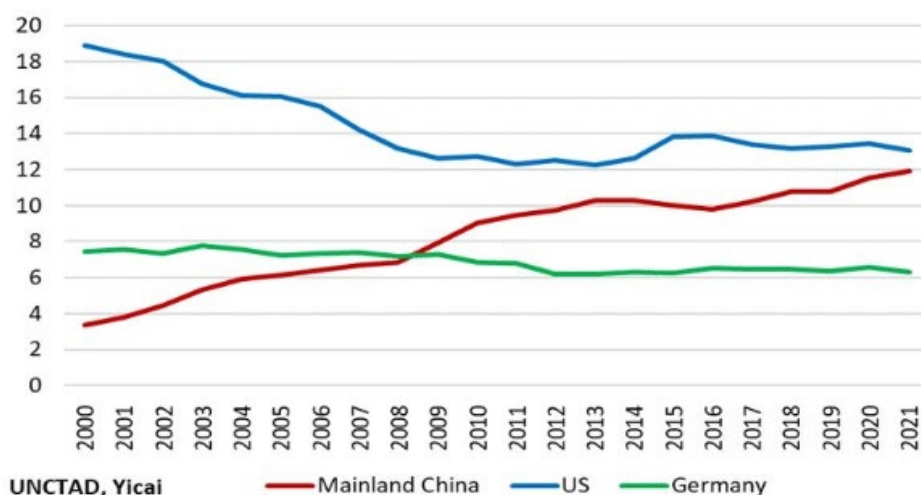


图 8 全球商品进口份额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压力可能使得中国采取日本式的战略，用对外直接投资取代出口（图 9）。

日本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在 1993 年达到 9.6% 的最高值，但去年降至 3.4%。造成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减少且年龄增大。日本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6% 上升至 2019 到 2021 年的 14%，这是由于日本公司将部分生产转移至海外，以利用海外国家更丰富的劳动力。

因此，随着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的生产率带来的压力，预测中国在未来几年将成为更重要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来源不无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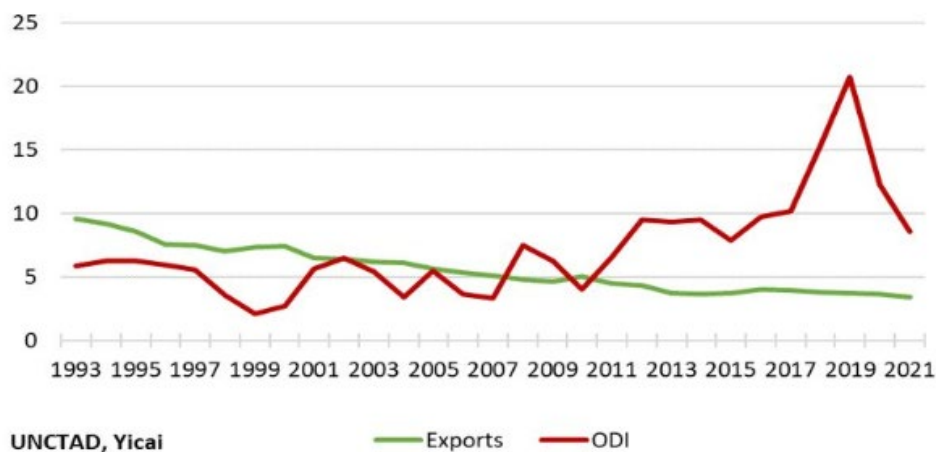


图 9 日本在全球商品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

作者：柯马克（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2022 年 9 月 21 日

经管资讯

经济体制改革阔步向前

经济总量由 2012 年的 53.9 万亿元上升到 2021 年的 114.4 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6300 美元上升到超过 1.2 万美元……这十年，中国号巨轮不断破浪前行，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充分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取得了新突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系统性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

1 市场主体改革深入推进，各类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为各

类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制定以岗定薪的干部管理机制，启动全面撤销分厂改革，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辽阳石化依靠改革，转型升级之路越走越开阔，相比 5 年前，企业人均产值增加 87%，劳动生产率增长 108%。

顶层设计精心勾画，重大试点梯次展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10 年来，国资国企改革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一批实力更强、结构更优、

效益更好的央企国企脱颖而出，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发展“顶梁柱”“压舱石”作用。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259.3 万亿元，比 2012 年底增长 2.6 倍。

——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舞台。

今年 1 月 8 日，两趟首发复兴号列车从浙江台州站、嵊州新昌站开出，分别驶向杭州、温岭方向，标志着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不仅在铁路领域，石油天然气行业上游对外资和民营企业放开，国有航司混改引进民营战略投资者……近年来，重点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稳健发展，越来越多民营企业进入重点行业和领域，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2 宏观经济治理改革持续创新，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

挖掘机长臂挥舞，工程车来回穿梭，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马道枢纽建设现场机声隆隆，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开建。今年 8 月，国开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投放 72.73 亿元用作项目资本金，助力项目及时开工。

设立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使用进度……今年以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挥合力，为一系列重大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更好发挥投资对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关键作用。

——宏观调控不断完善。

10 年来，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的各个领域，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既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

调控政策加强协同。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一张蓝图绘到底”。

调控方式不断创新。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调控方式更加灵活有效，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更多依靠改革创新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调控工具持续丰富。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改革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调控手段更加聚焦结构性矛盾，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事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到 2020 年底，企业开办时间已经由平均 22.9 天压缩到 4 个工作日以内，“动动手指交材料，足不出户办证照”成为现实。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成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突破口。2013 年以来，国务院累计取消和下放 1098 项行政许可事项。

在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市场主体如同雨后春笋般萌发壮大。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到 1.54 亿户，比 2012 年底增长了 1.8 倍，年均增幅达 12.1%。

3 基础制度改革蹄疾步稳，市场体系建设高水平推进

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全球最大的 5G 网络、全球第一的高铁运营里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 100 多万亿元经济总量、14 多亿人口、4 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内需市场逐步形成、活力四射。

市场规模效应的不断显现，离不开这 10 年来市场体系改革的全面突破。

市场基础制度不断夯实。立法、执法、司法全方位产权保护制度体系逐步形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完善……

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断完善，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劳动力顺畅流动，科创板、创业板相继试点注册制激发资本要素活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中央做出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部署。一条条政策措施都指向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蓝图前所未有地清晰。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改革无止境，继续蹄疾步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个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必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将加快构建。

作者：赵展慧

来源：《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7 日第 001 版

上海：非凡十年创新与发展齐头并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的科技与金融取得飞速发展。上海科技创新十年奋斗历程，是一段以“创新、改革、开放”为时代强音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十年来，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1 科技持续攀登高峰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里，上海科技实力迈上新台阶，从研发投入的增长就可见一斑。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党委书记徐枫在上海召开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委专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从 2012 年的 679.46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1819.8 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 3.31% 增长到 4.21%。一批重大原创成果相继涌现，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综合水平迈入全球主要创新型城市前列，去年在世界科技创新集群中排名第八。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上海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10 拍瓦激光放大输出、首个体细胞克隆猴、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等一批上海成果，实现了多个全球“首创”。截至 2021 年年底，上海累计牵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项目 929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554 项，资助资金和项目数量居全国前列。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上海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上海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加快高水平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发展；加强基础前沿探索和关键技术突破。截至 8 月底，已有 71 家上海企业登陆科创板，市值超 1.4 万亿元。

面向经济主战场，上海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加快培育。聚力三大先导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持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集成电路产业基础能力进一步增强；生物医药创新研发实力持续提升；人工智能创新布局与应用加快实施；支撑引领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上海科技更是有效惠及民生福祉。打造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加快培育和建设一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重点实验室。成功研制亚洲首台 11 兆瓦直驱海上风电机组，在全国率先启动低碳科技攻关布局，发起成立上海碳中和创新联盟，编制《上海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推动绿色技术银行建设。

这十年，上海不仅在科技创新上不断取得突破，还全面发力科技体制改革。2015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 22 条”，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这一体制改革总目标。2019 年，为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以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为主线，上海发布实施科改“25 条”，对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谋划和科学布局。除此之外，上海还出台一批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如 2017 年出台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 2020 年颁布实施的《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另外，上海探索了一批重大改革试点，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支持上海交通大学落实国家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正加快推广固化。

说起改革，离不了开放。这十年，上海科技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一方面，上海国内外创新资源集聚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上海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针对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情况及发展成效，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所长石谦谈道，从自身进步维度来看，上海正朝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目标快速迈进，上海科创中心指数从 2012 年的 109 分增长到 2021 年的 380 分，连续十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2-2021 年，研发投入从 679.46 亿元上升到 1819.8 亿元，增长了近两倍，研发强度从 3.31% 提高到 4.21%，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投入强度，均处于全球前列的水平。

从全国贡献维度来看，上海是中国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先锋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坚持服务国家力量，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任务等都位列全国前列，一批批顶尖人才在上海集聚，去年年底上海拥有两院院士 185 人，高水平原创成果不断涌现。

从全球影响维度看，上海已迈入重要科创城市的行列。在去年各个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榜单上，上海均处于 8-15 名的位置，并保持着稳定提升的势头。去年表征技术全球化布局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上海为 4830 件，占全球的比重接近 2%。

2 金融战略地位凸显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提出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

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信亚东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党委专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年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金融总量大幅跃升，金融改革深入推进，金融开放持续扩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日益健全，国家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2020 年，上海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为全面提升能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十年，上海金融市场格局日益完善，金融中心核心功能不断增强。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能力不断增强，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更加完备，在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大力支持下，新设上海票据交易所、上海保险交易所、跨境清算公司、中国信托登记公司、中央结算公司上海总部、城银清算公司等多家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从数据来看，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量占全国比重约 50%。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从 2012 年的 528 万亿元提高至 2021 年的 2511 万亿元。

这十年，上海金融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数据显示，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从 2012 年的 3.9 万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18.3 万亿元。截至 9 月末，科创板上市公司 473 家，累计募资总额 7181.8 亿元，总市值 5.5 万亿元。上海已成为国内外主要的金融科技企业集聚地之一。

在人才培养与引进方面，上海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加快构筑。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成立上海资产管理协会，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十的资管机构均在沪开展业务，公募基金、保险资管规模占全国比重均达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上海金融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金融中心城市影响力明显提升。金融法治建设深入推进；信用与消费者保护体系不断健全；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日益完善；建立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海市）和上海市金融稳定协调联席会议制度；金融品牌知名度日益扩大，“陆家嘴论坛”已成为国内外金融高端对话交流的重要平台。

信亚东特别提到，为了更好地发挥上海金融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上海支持企业纾困稳增长，加强同国家和在沪金融管理部门的沟通协作，在市政府出台的抗疫助企、经济恢复重振以及新一轮稳增长政策中，涉及金融的支持政策有 30 条，包括加强对企业融资担保支持、实施困难企业贴息政策等，及时将国家惠企政策落实落地，同时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是上海金融业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上，努力

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支持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年。同时，也是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以及各金融监管机构以改革创新服务上海承载的各项重大国家战略，并取得突出成效的十年。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孙辉给出了一组数据，2012-2021 年的十年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从 2.1 万亿元增加到 4.3 万亿元，年均增长 8.2%，同期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 11% 增长到 18%，今年上半年为 21.3%。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从 528 万亿元增长到 2511 万亿元，增长近 4 倍。今年 8 月末，上海本外币贷款余额 10.1 万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 19.1 万亿元，分别是 2012 年底的 2.5 倍和 3 倍。

此外，上海银保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琦介绍，这十年，上海银保监局始终有力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持续巩固金融开放门户枢纽地位，深入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有力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积极投身人民城市建设，同时切实防控重大金融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来，上海资本市场整体发展迈上新台阶。目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规模达 49 万亿元，十年来增长近 2 倍，从全球第七位跃居第三位；债券市场累计融资近 34 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债券市场。

今年以来，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额 107 万亿元，是 2012 年同期的 3.2 倍。上海证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登勇介绍，十年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深度显著拓展；上海上市公司质量稳步提升；上海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上海资本市场和行业双向开放取得积极进展；上海资本市场法治诚信环境持续优化。

3 未来坚持合作与发展

根据科创中心指数和关键的指标历年数据分析，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成效在自身进步、全国贡献、全球影响三个维度上，都反映出上海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整体性的变化。徐枫表示，在科技领域中，立足新发展阶段，上海将继续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孙辉表示，2020 年已如期实现基本建成与国家经济实力 and 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阶段性目标。下一步，在提升能级方面，重点是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加强制度性创新。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另一方面，推进重大金融改革创新，特别是科创金融和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创新。王登勇表示，上海证监局将继续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全力维护上海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推进上海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向更高能级。

面对新征程，上海银保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琦表示，上海银保监局将不断推动辖内银行业保险业更好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金融力量。

上海金融系统着力构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信亚东表示，下一步，上海将继续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满足实体经济需求、产业的转型升级、科技的自主创新的角度推动金融改革，加强金融服务，更好促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顾春娟

来源：《国际商报》2022 年 10 月 14 日第 007 版

10 年来全国新设“四新经济”企业 2545.4 万户

市场监管总局 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643 万户。从发展趋势看，新设数字经济企业发展迅速，占比由 2012 年的 6.3% 提至今年的 15.3%。从细分行业看，“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占比较高，分别为 50% 和 41.6%，数字赋能趋势加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新设“四新经济”企业 2545.4 万户，占全国新设企业的 41.7%，且呈逐年上升态势。其中，“现代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占比较高，分别为 24.5%、19.5% 和 19%。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导向的“四新经济”企业增速高于同期企业总体增长水平，成为市场经济的新增长点。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专利授权情况看，截至 8 月底，全国拥有专利的企业有 113.3 万户，授权专利共 1551.2 万件，分别是 2012 年的 7.4 倍和 9.7 倍。其中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 33.3 万户，授权发明专利 225.5 万件，分别是 2012 年的 8.2 倍和 11.1 倍。授权专利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分别达 52.5% 和 21.3%，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作者：余颖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10 月 13 日第 003 版

依法保障稳外资

当前，稳定外贸外资对稳增长、稳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进出口有力支撑稳增长稳就业，要加力稳定外贸外资。

面对变化交织的国际形势，依靠法治维护平等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广大外资企业颇为关切的因素。我国外商投资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两年来，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蔓延，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受到明显冲击，但我国利用外资依然保持逆势增长，实现了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全球占比“三提升”。这充分说明，外贸外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外商投资法等法律制度和地方立法的完善，既为外商投资经营活动提供了基本制度框架和规则，也为有关部门和各地履行外资促进和管理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近年来，中央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健全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动制度型开放等作出战略部署和安排。日前，《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条例》审议通过，将于

今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这是地方立法对外商投资法的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依法保障稳外资，才能助力经济巩固恢复基础。今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外商投资法执法检查，这是推动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提升外资信心，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改革和创新的具体体现。通过执法检查，特别是针对企业重点关切问题，要进一步落实好外商投资法等法律关于外资促进、保护和管理的相关规定。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深化“放管服”改革，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适用国家各项支持政策，平等获取人才、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保障平等参与标准的制定工作。加大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落实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严厉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调解工作，切实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在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还要加强与外资企业的沟通，通过对外资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政策解读，帮助企业理解我国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同时，统筹扩大开放与监管规范，依法完善外商投资监管制度，强化监督检查机制，加强对重要领域、重点地域外商投资风险提示和预警，有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作者：李万祥

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9 月 21 日第 005 版